



历史与理论

全球史学史

(第二版)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2nd Edition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Supriya Mukherjee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美〕王晴佳 〔美〕苏普里娅·穆赫吉 著
杨豫 〔美〕王晴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全球史学史

(第二版)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2nd Edition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Supriya Mukherjee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美〕王晴佳 〔美〕苏普里娅·穆赫吉 著
杨豫 〔美〕王晴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61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学史/(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穆赫吉著;杨豫,(美)王晴佳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
(历史与理论)

ISBN 978-7-301-30489-1

I. ①全… II. ①格…②王…③苏…④杨… III. ①史学史—世界 IV. ①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4504号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Supriya Mukherjee: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Second Edition

ISBN: 978-1-138-94226-4

© 2008, 2016 Georg G. Iggers, Q. 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2017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全球史学史(第二版)

QUANQIU SHIXUE SHI

著作责任者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美]王晴佳 [美]苏普里娅·穆赫吉 著 杨豫 [美]王晴佳 译

责任编辑 李学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48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21.875 印张 419 千字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2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史学史？^①

(中文版代序)

王晴佳

本书的作者之一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于2017年11月26日、以90岁的高龄告别了人世。此书中文修订版的出版,是对他老人家一个很好的悼念。伊格尔斯先生生前,对中国十分友好,自1984年之后多次访问中国,在中国学术界交了不少朋友,多次接受中国学人的各类采访。他所有的重要著作,也早都有了中文版,拥有不少读者。我想在伊格尔斯先生离世和本书出版之际,认真回顾、总结一下他在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特点和遗产。具体而言,本书将从下面两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对如何开展史学史研究的体会和反思,目的是与读者交流、切磋。

一 全球着眼、克服偏见

现在想来,我有如此荣幸,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与伊格尔斯先生多次合作,包括写作此书,这与他有心提携、帮助我

^① 这篇代序的主要内容,曾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有关。而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研究中提倡、坚持的一种立场,那就是如何在史学史的研究中,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努力将世界各地的历史意识及其表现形式,平等看待并恰当处理。

但这并不容易。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起源于西方,其性质是对如何写作历史,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加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毫无疑问,以中国史学传统之久,中国史家也有总结历史书写传统的论著,唐代刘知几(661—721)的《史通》和之前刘勰(约465—532)的《文心雕龙·史传》篇,都是著名的例子。从内容上来说,《史通》显然更为广博,而《文心雕龙·史传》则更像是对史学传统的一个简要的回顾。在中东史学的传统中,也出现了一些精湛的史学理论著作。不过,这些类似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均没有成为专门、系统的学问。

西方的第一部冠名史学史的著作,应该是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ère, 1541—1608)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他的老师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则在之前写出了《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探究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方法。他们所处的16世纪,属于文艺复兴的晚期,也正是西方史学走向近代化的初期阶段。其后的17世纪,欧洲经历了科学革命,导致其一跃而起,在科技发展等领域,迅速超越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受到牛顿、伽利略

等自然科学家的激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开始思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的论述各个不同,不过其总体倾向是认为经历了科技长足发展的欧洲文明,将会引导和领导其他文明共同进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张理性的扩张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因,而理性在世界历史上最终会由德意志民族所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一版的序言中也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也就是说,西方工业文明代表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的确,到了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历史发展的动因和规律的时候,西方文明称霸、引领全球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因为它已经轻松击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文明。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注重考虑的是,如何揭示和预测资本主义世界走向灭亡的原因及其如何将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而其他历史哲学家则满足于论证和解释西方文明在16世纪之后一马当先、领导世界的原因和过程。与哲学家不同,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版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3/001.htm)。

Ranke, 1795—1886) 提倡“如实直书”,即用经过考订的史料如实地重构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句貌似谦逊的口号,其实反映了兰克对近代史家运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构历史的巨大信心。同时兰克的这句表态,也映照了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引领世界潮流的自信,认为这一过程已经不证自明,只要“如实直书”就明白无疑了。于是,19 世纪成为了“历史学的世纪”,大量历史著作出版,用以揭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同中国唐代的官修史学影响了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一样,近代西方的史学写作模式也为其他地区所效仿。

而且,随着西方强权在整个世界的进一步扩张,西方近代史学的写作形式——叙述体——也逐渐成为了今天世界各地史家模仿、采纳的对象。到了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系统的史学史著作也不断出现,目的是归纳、总结近代史家的作品及其成就。乔治·古奇(George P. Gooch, 1873—1968) 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于 1913 年问世,顾名思义,这是那时出版的多部史学史著作中,比较典型的总结 19 世纪史学成就的一部作品。重要的是,虽然古奇为其掌握的语言所限,无法照顾到世界各地的历史研究,但此书概况的内容,仍然是十分广大和及时的。古奇不但以当代史学的发展起始,而且其视角不以西欧、美国为限,也评价和讨论了东欧、北欧、南欧地区的史学作品。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立场和态度,就是认为西方的历史观

念和方法,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应。换言之,西方中心论思维的背后,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理念。正是在这一理念的驱使下,西方学界在叙述自身文明历史的同时,也努力研究非西方、也即所谓“东方”的文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便从批判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西方近代学术中“东方学”的起源和特点。

在史学史的领域,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普遍主义尝试。赫伯特·白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是在古奇之后,专门研究史学史的英国史家,其著作《辉格历史观》(*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出版于1931年,让他名闻遐迩。白特菲尔德之后著述很多,大多讨论西方历史学的起源、特点、与基督教的关系及社会功用。但在他去世之后,由别人帮助整理并于1981年出版的《历史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istory*)中,视角移到了中国的史学传统。之后在1969年,与白特菲尔德一样也在剑桥大学任教多年的杰克·浦朗穆(J. H. Plumb, 1911—2001)出版了《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用更大的篇幅将西方史学与中国和其他地区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做了比较。

白特菲尔德和浦朗穆都不是汉学家;浦朗穆更不专门研究史学史。但他们关注中国史学,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着历时悠久的史书编纂传统,很难忽视。而另一点则是,他们的心态和做法,与萨义德笔下的西方“东方学家”类似,试图在与中

国史学的比较中,抬高西方史学的优越和高明。在浦朗穆《过去之死》一书中,这一特点的表现特别明显。此书根据作者1968年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系列讲座讲稿写成,其主旨是强调在那时的世界,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历史研究为何仍然重要。由此,浦朗穆几乎必须涉及中国史学编纂的悠久传统,因为中国古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已经是一种常识。他在导言中承认其成就但又评论道:

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Einhard, 775—840)和奥托·弗莱兴(Otto of Freising, ca. 1114—1158)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从未尝试过客观地处理和理解历史,更谈不上成功。^①

浦朗穆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传统史家,都为“过去”所困,无法从现在的立场来看待、研究过去。他的书分为三章:(1)作为权威的过去;(2)作为命运在过去和(3)历史学的作用。浦朗穆认为,在近代西方出

^① J. H.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3), pp. 13-14.

现新的历史观念之前,以前的中西伟大史家,如希罗多德、李维、塔西佗、司马迁、司马光等人,都服从于过去,希望保留有关过去的知识。其中修昔底德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修昔底德希望如实地重构过去,不过浦朗穆指出,修昔底德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遍真理(人的本性、善与恶、历史的机遇等等),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会使用许多无法核实的对话,即现在看来掺杂了想象的写作方法。然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他称之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他说司马迁的写作,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不但用自己的语言重述了古代的典籍,而且也基本相信了那些文献所述的史实。所以总体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是为官吏写的一本有关过去的知识手册。司马迁的著作传递了大量的信息,展现了道德生活的理想状态和实际历史之间的互动。但没有展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批评——没有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不同这一立场上理解过去”。^①

浦朗穆对司马迁史学和整个中国史学的看法,显然有明显的偏颇之处,我们将在下面详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过去之死》将西方与中国史学对立来比较,突出前者的优越和先进,这种明显的“东方主义”的做法,在今天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影响。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1969年出版之后,几次重印,后来在2003年又由英国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公司

^① Plumb, *The Death of the Past*, pp.20-21.

出版了第二版。更有甚者,这个版本由当今两位著名史家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萨蒙·夏玛(Simon Schama)为之作序、哈佛大学的讲座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之写了导言。他们两人都是英国人,前者曾在剑桥大学求学,与浦朗穆有师生渊源。但无论如何,他们出面为浦朗穆推荐此书,不会完全出于师生情谊,而是显然也认同浦朗穆的史学观点。还有必要一提的是,浦朗穆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颇为多样,并无专攻,但他的著作,除了《过去之死》之外,还有其他也在后来结集重印。浦朗穆这个人物及其史学,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英国乃至英语世界史学的传统和特点。

像文化传统一样,历史观念一旦形成,一时无法很快改变。台湾史家杜维运(1928—2012)在其出版于1981年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对浦朗穆有专门的介绍,并对浦朗穆所谓中国传统史家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做了专门的反驳。^①但杜的著作用中文写就,没有为西方学界注意。1983年香港史家许冠三(1924—2011)针对浦朗穆和其他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批评,在英国的《历史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批判传统》,举

^① 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13—16、61—75页。

例说明中国传统史家对史料的谨慎、批判意识和手段。^①可惜此篇文章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至少萨蒙·夏玛和尼尔·弗格森未加采纳。西方有句俗语，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其实在浦朗穆写作《过去之死》之前，他剑桥大学的同事、汉学家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1922—2013）就发表了《中国的历史批评：刘知几和司马光》一文，指出了中国史家对史料的批判手段和意识。^②或许蒲立本此文对浦朗穆的效果仅仅是，后者主要批评了司马迁缺乏史料批判意识，而没有针对司马光。

由此而言，我们特别需要指出和怀念伊格尔斯先生的胸怀和贡献。伊格尔斯生于德国汉堡，十二岁的时候与父母逃离了德国，幸免于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他在大学主修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到了硕士阶段进入芝加哥大学才转而进修德语。不过他于195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仍然以法国思想为主题，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崇信权威：圣西门派的政治哲学》。他的第二本著作《德意志历史观念：赫尔德以来的历史思想之民族传统》，确定了伊格尔斯在德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他之后发表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更让他成为欧洲现代史学的专家。也就在差

① 见 Hsu Kwan-san, “The Chinese Critical Traditi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6:2 (June 1983), pp. 431-446.

②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W. G. Beasley &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35-166.

不多同时,他与时任杜克大学的哈罗德·帕克尔(Harold T. Parker)一起主编了《国际历史研究手册:当代的研究和理论》(1979),其视角几乎遍及全球。比如有关中国的史学,他邀请了在他之后几天过世的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撰写。《国际历史研究手册》是英语世界中,较早一本力图平等地处理各地区史学发展的著作,出版之后颇有影响。不过,伊格尔斯在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时还主要以欧美史学的发展为线索。此书缘起于伊格尔斯受邀在一次哲学会议上的发言,谈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及其受到的挑战,由此而发展成书,先在德国出版,之后经他自己修改补充,于1997年出版了英文版,广受关注和好评(此书已经被译成了十多种文字)。

伊格尔斯在写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时,已经多次与我商讨如何从全球的角度,考察和研究近代史学的变迁。如同本书的谢词中所说,伊格尔斯那时收到了英国老牌的朗曼(Longman)出版公司(出版乔治·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公司,现已经并入劳特里奇出版公司)的书约,写一部近代史学史。他与出版商商量,邀请我为合著者,将此书的范围从西方扩展到全球,即以《全球史学史》为标题。这一合作,也促使我自己扩大研究的视角,从中国史学与西方的互动及在近现代的转化,转向考察和比较东亚史学近代化的异同。而为了写作《全球史学史》,我不但负责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还研究和写就了中东地区的史学传统及其近代

转化的章节,让我受益匪浅。^①之后我们又邀请了伊格尔斯的印度学生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加入,由她负责印度和女性主义史学的部分。《全球史学史》出版之后,普受好评,除了翻译成中文之外,还有了俄文版、德文版和希腊文版。伊格尔斯先生作为西方史学史领域世界公认的权威,不以其专长为限,而是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推动史学史研究的全球视角,功劳卓著,殊为难得。这不但是他晚年治学的一个亮点,也为史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后人无法忽视的新方向。

与伊格尔斯合作《全球史学史》和其他著作,不但是我的莫大荣幸,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反思以往史学史研究的偏狭之处。除了本文已经谈论很多的西方中心论之外,我觉得中国史家也需要检讨自己的偏见。我们虽然不满西方中心论,但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史家对其他文明的轻视。这一偏见的主要表现是将文字记载的史实视为历史学的主体。我们提及中国传统史学,便常常用汗牛充栋这样的字眼,形容中国史书的丰富,并为之感到骄傲。但如果希望用平等的观点看待所有的文明,认为各地区的人类团体都有历史意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那么就需要承认,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不能仅仅

① 我曾侧重考察中日史学近代化路径的异同,写过多篇文章,分别载于《史学理论研究》和《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最近的一篇题为《传统与近代的互动与折中:清代考据学与明治时期日本史学之变迁》,收入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近代中日关系史新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17年,第339—388页。

以史家的历史书写为唯一的对象,更不能仅仅以现代意义上的论说文风格写作的史书为基础,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走出西方历史观念的藩篱。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史书需要以“散文”(prose)而不是“韵文”(verse)的形式出现。但在其他许多文明(如中东、印度乃至中国)中,人们用诗性的、韵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和叙述,还有如非洲和其他传统文明的历史意识,甚至采取了口述的、诗歌的形式。毫无疑问,这些韵文和诗歌形式记载的历史意识,似乎让人感觉不够实证,因为出于押韵、咏唱等需要,词句的选择和表达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似乎无法如作者所愿陈述史实。但其实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指出和强调的那样,即使用论说文形式写作的史书,作者也无法完全做到“我手写我心”,完全超然无误地写作,因为语言并不透明;历史书写会有意无意地反映语言的内部结构以及作者本身对文体的偏好。^①因此就本质而言,论说文所陈述的史实与其他文体写作或记录的史实,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和刘知几的《史通》,都用的是骈体文,也即韵文,所以克服将论说文视为历史书写最佳体裁的偏见,不但有助于我们从平等的角度看待世界各文明的历史意

^①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就希图揭发历史书写在语言层面的“深层结构”,对现代史学的影响颇大。怀特认为史家写作受到语言结构和文体的限制,因此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无异,这显然走得过远,但他揭示语言本身的深层结构及其对写作的限制,却让人有所启发。

识及其表现,而且也能让我们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和价值。

二 时代感和批评意识

2017年我与北大李隆国合著了《外国史学史》,我们在序言中强调:以往的经验、事例证明,史学史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史学史著作的出现,通常是在历史研究经历重大转向之后的产物”。^①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重述一下相关的立场。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虽然简短,但却勾勒、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成就,认为《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奠定了这一历史书写的传统,而在汉代之后,这一史学传统已经走向衰落,于是他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的说法。而到了三国时代,除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勰对其他著作,更多批评:“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②有了这一负面的观察之后,刘勰在《史传》中对历史书写提出了种

①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②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171页。

种评价和建议,此处不赘。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所以重要,因为它在汉代灭亡之后的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转而总结、评价了自先秦至汉代的早期史学的成就。

同样,刘知几的《史通》也批评回顾了从先秦到唐代的史学传统,然后对今后的历史写作提出了许多建言。与刘勰一样,刘知几生活的年代,也是一个历史变迁、文化转向的时刻。如果说前者经历了汉亡之后,华北所经受的包括所谓“五胡乱华”的剧变,后者则目睹和经历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盛世。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唐代皇帝的支持,中国官方史书编纂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现今流传下来的“二十四史”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唐代史家编纂的。这一官方修史的传统,在隋唐之后一直为历代朝廷所坚持和发扬光大。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着眼,唐代所建立的官方修史传统,还形塑了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的历史编纂传统,形成了前近代东亚史学的一大特色。由此来看,刘知几的《史通》也是在历史转变的重大时刻,对史书编纂的传统加以总结、批评和鉴定的一部出色的著作。

西方的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上面我们提到的法兰西人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和让·博丹的史学史、史学方法的研究,也出现在文艺复兴这个后人视为近代历史开端的时刻。中外史学史的这些先例表明,史学史的研究需要体现时代感,在历史转向的时刻,对以往的史学成就做出批评性的评价,以助其将来的健康发展。换言之,史学史的研究,不是